

消除隔阂 促进社会和谐 大学新鲜人创设真人图书馆

9名大学生把15名有着特殊工作和生活经历的人化身成为书本，以“真人图书馆”（Human Library）的方式，供公众借阅并在现场进行一对一交流，希望公众通过对话和交流，减少对某个社群的偏见，增进相互理解。

杨漾 报道

“爱之病患者最终能够接受患病的事实，但他们却很难接受被家人唾弃或面对社会的偏见。”

两年来，诺莱妮（44岁）在爱之病行动小组（Action for AIDS）的义工经验，让她对爱之病患者在社会上求存的挣扎和困境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她目前在小组设立的乐观生活中心（Positive Living Centre）担任经理一职，为患者提供心理辅导等援助工作。

诺莱妮认为，社会对这个社群很无情，人们一旦知道他们的身份，就直接作主观的道德判断。

她说：“我和他们接触时，绝对是对情绪的考验，每个爱之病个案都是令人难过的。事实上，并非所有爱之病患者是因为行为不检点而得病。但还是有很多人爱之病患者有种既定印象，那就是他们属于危险人物，咎由自取。”

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诺莱妮与爱之病患者接触的工作经验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你去翻阅，进一步了解爱之病患者的心理历程，减少对他们的偏见？

本地一组大学生把15名有着特殊工作和生活经历的人化身成为书本，以“真人图书馆”（Human Library）的方式，供公众借阅并在现场进行一对一交流。

“真人图书馆”的概念2000年发源自丹麦，并被多个国家运用。这是本地首次举办该活动。

在诺莱妮接触的病患中，有些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中年家庭主妇，她们大多是被丈夫传染，有些家庭甚至殃及下一代。

诺莱妮指出，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出自对病症的不了解。“别人经常会问我担心被传染。每次听到这个问题都哭笑不得，因为普通的肢体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

她也表示，社会给予爱之病患者异样眼光比病症本身还要难接

受，这会导致他们产生自我批判的心理，选择自己承受痛苦，最终造成了更大的精神负担。

诺莱妮说：“被染上爱之病的孩子其实最无辜，他们渴望的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拥抱。我们惧怕爱之病，却忘了这些患者其实也是普



自闭症资源中心特别企划经理余淑娟（左）和爱之病行动小组乐观生活中心经理诺莱妮，将在来临星期天化身“真人书本”供公众借阅，以一对一的方式分享与自闭症和爱之病患者接触的经历。

（陈渊庄摄）

通人，是好母亲、好妻子，是具有良好工作能力的人。”

除了诺莱妮，真人书本还包括长期与自闭症患者接触的工作人员、聋哑人士、热衷“跑酷”（Parkour，一种新兴运动，玩家利用建筑物进行高难度的动作，包括跨越障碍物、从高处跳下等）的年轻人和全职艺术家等。

活动发起人之一的赵敏惠（19岁，新加坡国立大学）和薛永洋（21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希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减少对某个社群的偏见，增进相互理解。这也是“真人图书馆”概念

所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

赵敏惠说：“我觉得很多国人也许对某些社群感到好奇，但不知道如何去了解，因为身边缺少这方面的信息，平时也没有接触。”

两人与另七名活动发起人在为自闭症孩童提供教育的新光学校实习时，深刻体会到自闭症的误解。因此，他们希望更多新加坡人能消除对自己不了解的社群的既定印象。

薛永洋说：“跟这些孩子接触后，我发现虽然他们在行为上与常人不同，但他们其实是很聪明的。我们只看到他们的外在，没有看到他们拥有的能力和好的一面。”

自闭症资源中心特别企划经理余淑娟（57岁）也是真人书本之一。她说，人们缺乏对自闭症的了解，有时在外看到表现反常的孩子时，通常会认为是父母教导无方。

余淑娟说：“如果别人知道问题所在，并有能力帮忙处理突发情况，自闭症儿也许就会更容易被社会接受，因为社会了解他们，并愿意帮助、支持他们。”

然而，正是因为缺乏这类支持，父母为了减少孩子在外的突发病情，久而久之，他们减少了与亲戚，甚至外界的联系。

另外，余淑娟也指出，由于自闭症没有治愈的方法，过于依赖父母的自闭症儿也面临着父母过世，无人照顾的长期社会问题。她说：“这个社群需要有亲戚家人和社会的支持。如果他们被孤立后，得到支持和理解就更困难了，也更难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真人图书馆”将于星期天（7日）在碧山图书馆举行，时间是上午11时到下午4时。公众到时将能自行选择真人书本，每人有约20分钟的一对一交谈时间。

去除偏见须承受一定风险

“真人图书馆”推翻社会偏见的宗旨获得受访学者的大力肯定。

新加坡管理大学亚洲学助理教授云昌耀指出，通过正面交流和沟通是促进了解的正确管道。

无知产生偏见，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既定印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他认为，这类活动只主办一次是肯定不够的，但它是一个好开始。

云昌耀也提醒，活动如果没有处理妥当，反而有可能加深公众对某些社群的误解和偏见。

他说：“有人觉得举办这类对话活动的宗旨就是尽量将形式简化，但我觉得如果是以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凝聚力为大方向的话，这样的活动绝不简单，因为所涉及的都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课题。而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类活动，让公众认识到这些课题的复杂面。”

由于“真人图书馆”面向的是大众，云昌耀认为，真人书本的选择很重要。

“这些书本要清楚知道他们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要做到这一点，他们要先清楚了解社会上对他所代表的社群的各种意见和争议。因此，他们在和公众进行交流时，要有能力解答问题，也需要有能力面对尖锐和敏感问题，这样才有代表性。”

客工和新移民课题可成为真人图书馆“藏书”

云昌耀也认为，客工和新移民的课题也适合加入“真人图书馆”。

他说：“国人对他们的认识太少，却又有很多偏见和既定印象。这两个社群都一定有他们生活中值得分享的经历。例如，客工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他们下班后都做些什么。新移民也是如此，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这个社群经历过什么，他们也可能是一群在新环境中挣扎求存的人。多一点了解，就会少一点偏见。”

国大副教授陈恩赐：对话可加强社群沟通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也赞同以对话的方式加强社群间的沟通。他认为，这些真人书本的背景被主流社群视为社会中的一种“偏差”（deviance），而国人因为缺少与他们的接触而产生了误解。

陈恩赐也认为，如要增加这类对话活动的成效，应该为其中所潜藏的风险做准备。

他说：“需要制定一些基本规矩让参与者遵守，例如允许有反对的声音，并尊重社会的多样性和社群间的差异。”

✉ yangyang@sph.com.sg